

权力与经济增长

——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张建新 著

7. 120

上海人民出版社

F757. 120
Z127

权力与经济增长

——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张建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权力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张建新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8-06097-5

I. 权... II. 张... III. 对外贸易政策—研究—美国

IV. F75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0350 号

责任编辑 湛 嘉

封面装帧 杨德鸿

权力与经济增长

——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张建新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插页 4 字数 278,000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097-5/F·1374

定价 20.00 元

霸权衰落及其政策反应

（代序）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政治因其切中肯綮而成为人们理解国际关系的第一想象。自从以权力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学派兴起以来，它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影响之深，映射之广，历时之长，可以说是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派难以望其项背的。尽管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学在学术争论中免不了受到批判乃至痛遭诋毁，尽管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似已显示出转型的迹象，但权力政治依然是各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起点，它必将继续引导精英和大众的国际政治视野。比较起来，继现实主义学派之后，国际关系领域可谓巨匠辈出，学派纷呈，各派理论虽各有优长，但是它们在揭示国际政治的原动力及其规定性方面均显得力有未逮，就学术生命力而言，有些学派只是昙花一现，有些学派仅仅影响了一个时代。诚然，像现实主义学派这样具有长久影响者，在国际关系理论史上是少见的。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学术思想上兼收并蓄，推出了许多有深度的经典之作，“求之细则无穷细，推之广亦无穷广”，对于冲突与战争、和平与发展、国际体系的性质与结构等重大国际关系问题，追根溯源，探微索隐，在理论上极尽雕琢之能事，散发着恒久非凡的学术魅力。在现实主义学派中，以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和罗伯特·吉尔平为代表的霸权稳定论，正是因其理论之大气与逻辑之严密而自成一派，并深得西方国际关系学者青

睐。霸权稳定论被称为“贸易政策的政治学”，它把贸易政策和权力政治结合起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IPE)视角解释国际体系的性质、结构及其变迁的规律性，极大地开阔了国际关系的理论视野，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地终止了历史上政治学和经济学相分离的学术研究传统，众所周知，国际经济贸易实际上是深受政治因素强烈影响的。

本书并非侧重于霸权稳定论的理论研究与批判，而是着重于霸权稳定论的经验性验证。经验来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贸易政策，这个时代涵盖了克林顿政府的两个任期，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克林顿就任第 42 届美国总统之际正是冷战终结、两极解体的历史转折关头，他对于如何管理美国具有崭新的思路（不论这种思路是否成熟或成功），在如何看待冷战后国际体系性质以及美国在冷战后国际体系中应发挥什么作用等问题上，克林顿的政治哲学与其前任老布什大异其趣，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将之定义为全球主义或多边主义，克林顿要通过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战略来重新掌控世界。二是美国的自我定位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美国在经济上不再以霸权自诩，这对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包括对外贸易政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由于这两个特点，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更倾向于以重建美国霸权为中心。因此，我们可以把克林顿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定义为“霸权重建”政策。由于对外贸易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克林顿政府相当重视贸易政策工具及其操作艺术，贸易政策被认为是美国赢得经济优势和重建世界霸权的关键环节。

在美国霸权衰落时期，国际政治是否会像吉尔平所说的那样出现霸权空位期？按照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逻辑，由于霸权衰落，原来的霸主既缺乏能力又没有意愿向国际体系供给稀缺的国际公共物品（主要指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自由的贸易体

系、国际安全和对外援助等),而新霸主或者还没有挑战成功,或者希望继续“搭便车”而根本不愿意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正如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不愿意帮助当时日渐式微的英国霸权维系国际体系免于崩溃,这样就会出现“霸权之后”国际体系不稳定的可怕后果。霸权衰落必然引起争霸战争,上升大国向衰落的霸权发起挑战,导致整个国际体系崩溃和瓦解。当新霸主挑战成功,登上了国际政治的权力之巅,重新分配权力并确定国际威望的等级时,国际体系结构将随之趋于稳定。

霸权稳定论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正值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宣布推行“尼克松主义”,在全球范围实行力量收缩战略。一些学者认为美国霸权的巅峰期已经过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越南战争的泥淖标志着美国霸权已经进入可怕的衰落期。20 世纪 80 年代,霸权衰落的阴影一直笼罩着美国政学两界,有关霸权是否衰落的争论从未中断。然而,学术界对美国霸权衰落似乎有些反应过度。虽然美国已经结束了霸权巅峰期,但美国霸权并没有全面衰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苏对抗中,美国仍处于优势,而冷战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也尚存争议,至少美国霸权不是全面衰落,实际上,美国是“政治巨人,经济矮子”,霸权衰落仅体现在经济层面,只要通过节省霸权成本和实行有限的收缩战略就可以恢复经济实力,重新取得霸权。同时,挑战美国霸权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出现,无论欧洲还是日本,都只是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开始超越美国,缺少军事力量的欧洲和日本不可能成功地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既然没有挑战者,也就没有吉尔平所说的争霸战争,因此即使霸权有所衰落,国际体系依然稳定。从国际公共物品供给角度来说,虽然由于美国经济衰落减少了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但整个国际体系中的国际公共物品的存量和供给并没有减少,反而由于出现了新的供给模

式而有所增加,在霸权供给之外增加了全球集体供给和地区供给两种渠道,确保了“霸权之后”国际体系的基本稳定。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变迁

霸权稳定论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族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也是 IPE 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个代表性理论流派。有几个关键性人物对霸权稳定论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次提出了世界经济体系需要并且只能有一个“稳定器”,否则世界经济体系就难以稳定的理论;无独有偶,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同样阐述了国际体系“有霸则稳,无霸则乱”的治乱法则;罗伯特·吉尔平把金德尔伯格的理论引入政治学领域,同时对沃勒斯坦的霸权理论进行了二次抽象(再理论化),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霸权稳定论。虽然说霸权稳定论是相对系统的理论,但是它并非没有缺陷。实际上,自从吉尔平推出霸权稳定论以来,它所招致的批评比它获得的褒扬要多。其中罗伯特·基欧汉的批判最为深刻和有力。作为国际政治大师级人物的基欧汉在学术批判中没有破坏这尊神像,而是驾轻就熟地修补了神像身上固有的裂隙。他反复论证了霸权之后的国际体系不会崩溃,因为现代条件下争霸战争成本太高,且没有赢家,因此传统意义上的霸权周期起了变化,不会再出现一个挑战者,同时在霸权治下的和平时期业已形成了国际机制,在霸权衰落之后,国际体系在国际机制作用下继续维持稳定是完全可能的。

金德尔伯格堪称霸权稳定论的始作俑者,他对 20 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长的经济危机进行了研究,首次把霸权国家的领导权 and 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联系起来,宣称,开放和

自由的世界经济需要一个霸权或主宰的强国来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实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它在20世纪30年代远离国际事务,似乎还想免费“搭便车”。¹金德尔伯格称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一场霸权缺失的危机”,因为当时衰落的英国霸权根本无力保证国际清算系统,而美国却不愿取代英国承担相关责任,结果各国高筑关税壁垒,实行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如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度提高美国的进口关税税率,形成了自“厌恶性关税法”之后美国第二个进口税率高峰,其他国家则趋之若鹜,导致自由的国际贸易体系崩溃,进而引起国际政治体系失衡,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经济根源之一。金德尔伯格运用公共物品原理,强调世界经济中拥有“经济剩余”的强国应该承担供给稀缺的国际公共物品的责任。由于国际公共物品是有成本的,而广泛存在的“搭便车”现象会导致国际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为世界经济体系埋下隐患,金德尔伯格认为,国际体系中的超强国家由于提供了稀缺的国际公共物品而被体系中的其他成员尊为“霸主”。

罗伯特·吉尔平是霸权稳定论的集大成者。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吉尔平重新诠释了过去二千四百年的西方历史,分析了国际体系变革的历史条件和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政治。在方法论上,吉尔平通篇使用了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方法,从国家中心主义视角,入木三分地分析了国家在选择行动路线时如何进行理性推算。这样,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目的应是以能增加本国利益的方式变革国际体系。由于国家变革国际体系以谋取自身利益时必然要承担相应成本,因此,只有当国家认为这种变革有利可图时,国家才会力图变革这种国际体系。

吉尔平预先承认了现实主义的假定：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不断追求权力，彼此激烈竞逐权力的国家不得不遵循自助原则，被迫扩张自己的权力并企望强化自己对国际体系的控制。无论政治学还是经济学理论都依赖于一个相同的机械论假定，即权力和财富是以固定数量的形式存在的：当一个国家扩大其份额的时候，其他国家必然会蒙受相应的损失。²因此，权力分配关系的变化来自于国家间实力的不平衡增长，“国际关系之所以有原动力，是因为国际体系内权力的分配在一定时期之后发生变动这一事实。这一变动造成了国家间关系的深刻变化，最终引起了该国际体系本身性质的变化。”³

正是由于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历史上少数国家积累了超强的实力，形成了帝国。在古代西方，罗马帝国在长达数百年时间内居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其他国家则纷纷沦为罗马帝国的附庸或征服的对象。在民族国家兴起后，由于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变化，并且世界市场经济日益形成，帝国这样一种绝对的统治形式逐步被霸权所取代。近代史上的霸权首推荷兰。荷兰因为强大的海军和垄断了海上贸易而成为霸主。1651年第一部《航海法》颁布前后，一个英国人写道：“哪个国家能从事这么大的贸易，拥有这么多船只，她就能获得并保持海上统治权，从而获得并保持支配世界的威权”⁴。在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同西班牙结束了30年战争后，能不受干扰地集中精力从事海上活动的国家只有荷兰。⁵荷兰霸权的观念是公海，17世纪前半期，荷兰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一支舰队控制了海洋。马汉认为，“联省共和国把他们的尊荣和权势归功于他们的财富和舰队。”可以确信无疑的是，这种权势在1651年至1678年间，也就是荷兰霸权的顶峰时期受到了挑战。⁶

荷兰的霸权在英法的军事挑战中衰落下去,从工业革命开始,英国用霸权的继承彻底取代了传统的帝国周期。这标志着“在欧洲体系中,然后在全球范围内,继承性的政治经济霸权取代了国际关系中作为基本秩序原则的继承性帝国模式”⁷。在“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时期,英国基本保证了国际自由贸易和稳定的国际货币,英国霸权足足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在欧洲大陆,德国的兴起以及它迅速膨胀的争夺霸权的雄心,导致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混战”,“日不落帝国”从此衰落了。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源于德国要在多极欧洲实现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源于同样的动力,例外只是日本的迅速崛起意味着军国主义的争霸战争摧毁了整个东亚国际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霸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主导、建立了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系,通过8轮多边贸易谈判,不断降低关税壁垒,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的自由化。美国还建立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核心的全球货币体系,以保证全球金融稳定,防止出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崩溃的悲剧重演。美国在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给予欧洲大量经济援助,帮助欧洲实现战后经济重建,同时给欧洲和日本提供常规军事和核保护伞,以使其盟友免遭苏联的军事威胁。美国“一直在发号施令,于幕后拟订交通规则。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和世界贸易组织都是具有很多成员和详细决策规则的复杂机构。但是美国对它们也在静悄悄地施加着主导性影响。”⁸美国根据其霸权角色承担了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一方面,它可以据此将自己的意志部分地强加于西方盟友;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国家从美国霸权中受益而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国领导。

霸权带来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与和平,历史上与几个帝国或“单极时刻”相伴而来的是最和平的几个时期。罗马的优势地位给欧洲和地中海盆地带来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和平。与19世纪英国霸权相伴的是相似的和平与繁荣时期。国际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全球经济发展得更开放、更活跃,科学和工业也得以大力向前推进。

吉尔平霸权稳定论的重心在于霸权周期理论。霸权周期即指霸权国家不断兴衰的历史过程。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任何一个世界霸权都要经历一个从兴起、扩张、巩固和衰退的四个阶段。每当一个霸主兴起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反之则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下降期。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就是在霸权的盛衰中呈螺旋上升型发展与扩张。霸权周期同莫德尔斯基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波论基本一致。夺取霸权意味着某个国家从此登上了国际政治权力的巅峰,一般来说,在巅峰上待的时间不会太长,英国的全球霸权时期大约为一个世纪,但其霸权顶峰时期第一次仅有25年(1714—1739),第二次不过24年(1825—1849),其后开始走向衰落。美国霸权的顶峰从战后开始,结束于越南战争,前后不过延续了28年(1945—1973)。正如沃勒斯坦说的,“用纯粹的经济学术语来说,霸权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当然是不能维持下去的。”⁹

沃勒斯坦、莫德尔斯基和吉尔平等人认为,霸权国家的兴衰导致国际体系的变革。在一个霸权衰落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新崛起的霸权,国际体系变革是通过争霸战争来实现的。“通观历史,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与权力再分配之间不平衡的主要手段是战争,尤其是我们所称的霸权战争。”¹⁰虽然吉尔平也提到了和平变迁的可能性,但它没有对此加以重点论证,而是不惜笔墨地讨论霸权战争在国际体系变革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霸权,在任何程度上都至少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胜利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霸权战争是现存体系中大国相对地位转变的最终测定。按照吉尔平的理论,随着霸权衰落,国际体系陷于崩溃和失序,大国之间进行规模空前的争霸战争,直到某个大国在争霸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重新确定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重新排定座次,也就是说,各大国依据在争霸战争中所夺得的胜利果实和遭受失败的程度重新确立国际政治中的威望等级。“一次霸权战争之后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它改变了这一体系,以适应新的国际权力的分配;它带来了对该体系基本组成部分的重新安排。胜利和失败在体系中确定了明确的威望等级,从而与新的权力分配相适应。战争决定了谁将肯定国际体系,谁的利益将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得到优先照顾。……作为这些变化的后果,一个相对更加稳定的国际秩序和对国际体系更有效的统治在国际权力分配现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总而言之,霸权战争(不幸的是)是演变过程中能够起作用的和必要的组成部分,是国际体系的原动力。”¹¹

针对吉尔平关于霸权衰落导致国际体系崩溃,引发霸权战争的观点,罗伯特·基欧汉从理论上给予了有力的反驳,进而提出了著名的“后霸权”说。基欧汉批判了吉尔平的两个核心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国际政治秩序是由一个主宰的霸权创立的。基欧汉富有洞见地指出,并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霸权国家的存在是合作性关系出现的必要或者充分条件;第二个命题是,国际体系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也就是说,霸权衰落导致国际体系崩溃。基欧汉通过国际机制批驳了这个论点,认为国际机制建立以后,合作并不必然需要一个霸权领导者的存在,霸权后合作是可能的。¹² 国际机制理论对霸权之后的合作前景持乐观态度主要因为三点理由:一是霸权治下的和平时期形

成了国际机制,虽然机制可能需要霸主的干预才能形成,但国际机制符合体系中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即使霸权衰落,国际机制仍然会发挥稳定作用。二是挑战者的成本很可能远远大于其收益,因此难以想象在现存霸权衰落后,其他后兴大国会断然发动霸权战争,采取直接军事挑战的方式争夺世界霸权;特别是在核武时代,霸权战争中没有赢家,吉尔平所说的挑战者以霍布斯式的霸权战争改变国际体系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三是维持机制比创建机制更容易。

基欧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霸权后合作模式。虽然无霸权的合作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着互补的利益,这就使得某种形式的合作具有潜在的可能性。此外,当霸权衰落时,对国际机制的需求甚至会上升。美国霸权的遗产是以大量国际机制的形式继承下来的,这些机制为合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制度环境,如果没有这些机制,合作就会非常困难。因此,“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的国际机制网络是通过美国霸权建立的,这为构筑霸权后的合作模式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基础,并为有志于通过多边行动实现目标的政策制定者们所利用。”¹³

美国霸权衰落及其政策反应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外均出现了对于美国力量及其国际地位的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在众多争议中,单极时刻论和美国衰落论分别代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典型看法,美国衰落论最终在争论中占据了上风,特别是在克林顿政府的执政精英中颇为流行,甚至全面主导了克林顿总统第一任期的对外政策;产业工人则持相当激进的美国衰落论,成为克林顿政府实行对外贸易政策的制约因素。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贸易政策正好反映了

霸权周期中的“衰落—反应”模式。从霸权稳定论来说,美国霸权确实已经越过了权力曲线的顶峰,进入了以节省成本为特征的相对霸权阶段,霸主通过有条不紊地实施内外政策,重新积累“经济剩余”,以便再现霸权景象。

克林顿政府对冷战后世界形势和美国国际地位的判断明显区别于老布什政府。布什政府在世界事务中仍然以霸权自居,它突出北约作用,在欧洲维持大量驻军,并阻挠欧洲为深化其安全领域的合作而进行的任何尝试。1993 年克林顿决定放弃双边主义这种典型的霸权主义做法,以利于发展合作式的多边主义。克林顿政府转向多边主义合作的重要根源就是“婴儿潮”的一代人对美国国际地位的看法更为冷峻。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当时美国是世界上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其能力几乎不受限制。而经济领域则是三驾马车齐驱:美国、日本和欧共体。里根执政时期实施的扩军和减税计划忽视了维护产业与教育政策,自此美国将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至少是金融财政方面的领导地位向日本拱手相让。1986 年世界最大的 10 家银行中有 7 家是日本银行,美国只有花旗银行跻身其中。¹⁴

东西方冲突的终结对美国霸权来说未必全是好事。它意味着霸权不再能够有效地影响和控制国际体系中成员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这是因为冲突所产生的外部协调性压力不再存在,同时能够控制竞争的霸权已经变得无能为力。其实,美国在经济上的霸权早已不复存在,这可能是从 1960 年至迟是 70 年代中期开始的。”¹⁵此时,美国在物质资源上的优势已远远比不上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比以前更不愿意从与欧洲和日本利益互补的意义上界定其利益。特别是欧洲国家,它们更加不愿意为了获得关键的、针对苏联的军事保护而跟着美国走。因此,美国霸权无形的主观部分和其霸

权体系所依靠的有形的权力资源一样,都已经受到了侵蚀。¹⁶

美国霸权衰落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如沃勒斯坦和吉尔平等学者指出的,任何霸权都不可能在权力的顶峰待得很久。“衰落只能被看做是发展,是其他地区在利润的效率方面的发展。”¹⁷这说明衰落是相对的,美国经济仍然在增长,但增长的速度远不及体系中的其他国家。美国科技仍然是领先的,但领先的程度和范畴都大为缩小了。吉尔平总结了导致霸权衰落的几个影响因素。从内部因素来看,由于社会增长呈 S 形曲线,随着一个社会的老化,国民收入中防务和消费增加,投资减少,经济增长放缓,整个经济的生产基础受到侵蚀,霸主的收益率呈递减律。¹⁸

从外部因素来看,是霸权的政治统治成本增加和经济技术领先地位的丧失。霸权国家必须运用各种技巧寻求政治、经济资源以支持其统治地位。同时,它需要更多地依靠经济增长来产生必要的经济剩余,以及依靠国际贸易来保证硬通货。可见,现代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是通过经济高速增长率和有利的国际贸易或投资条件来为霸权负担提供资金。它们有足够的经济盈余来满足消费、防务和投资的综合支出,并且还有足够的贸易投资或服务盈余去满足霸权负担的支出差额。吉尔平认为,美国的做法恰恰相反,美国不是寻求各种方式去资助其统治地位,而是力求保证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的足够财政资源转向其他国家,以保持国际经济平衡。这就是吉尔平所谓的“霸权自我牺牲说”。根据这个说法,美国在冷战的第一个 10 年里依靠耗费其国际财政储备和缩减国内消费,资助了世界经济的复兴以及同苏联斗争的花费。在冷战的第二个 10 年里,美国依靠其贸易盈余和发行货币来支撑其全球军事和政治地位。结果,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支撑美国全球地位的机制导致了代价昂贵的

通货膨胀,从而使不稳定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在科学技术方面,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也受到了欧洲和日本的强大挑战,在许多关键性的高新技术方面丧失了原先的优势地位。吉尔平认为,“美国治下的和平”之所以比“英国治下的和平”短暂,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技术优势过于迅速地向它的经济和军事竞争者扩散。结果,通过向其他国家的扩散过程,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失去了它在政治、军事或经济方面得以成功的优势。而军事和经济技术由较先进的社会向较落后的社会扩散,是国际权力再分配的一个关键因素。¹⁹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逐步丧失其经济技术优势的标志是巨额贸易赤字。欧共体对外贸易在 1988 年占世界贸易的 39%,美国仅占 14%。1980 年美国的外贸赤字只有 200 亿美元,1989 年则达到了 1 100 亿美元,其中 45% 来自日本。在霸权时期,由于美国在经济上占有压倒性优势,在科学技术方面遥遥领先于欧洲国家和日本,因此,全球自由贸易对美国强大的经济生产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来说是极为有利的,正因为这样,吉尔平认为,霸主天生偏好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以荷兰为例,17 世纪时,荷兰是欧洲惟一具有足够的内外实力的国家,它极少需要重商主义政策。在英法等欧洲传统强国普遍奉行重商主义政策时,荷兰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自由贸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例外。²⁰诚然,自由主义适合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荷兰“自由的”分散结构恰好是这个国家强大的标志。“在这个霸权国家中,这样一种结构相对于其他中心国家来说则是实力的标志,这些国家确切地说需要增加行政集权,以尽力削弱这个霸权国家的经济优势。”²¹

在霸权衰落时期,受挑战的霸主应该如何行动? 根据瓦尔特·李普曼关于外交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使所承担的义务与资

源保持平衡”的观点,吉尔平提出了两种行动路线:一是受到挑战的国家能够寻求增加用于保持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承担的义务所需要的资源;二是它能够减少它现在承担的义务(及相应的成本),并不至于最终危害其地位。克林顿政府在第一任期大体上是按照吉尔平的理论来制定政策的。首先,克林顿决心运用各种手段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特别是日本和东亚各国,借此振兴美国经济。除了实施总额为 200 亿美元的一次性经济刺激方案外,克林顿还决定实行“多轨”贸易战略,以削减赤字,促进经济增长。在现代自由贸易环境下,一国的福利主要取决于国际贸易产业的成功。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贸易赤字不断攀升,成为美国经济衰落的一个重要信号。美国在战后的经济优势首先是通过与欧洲和日本的贸易优势体现出来的,因此美国政府对贸易地位相当敏感。克劳塞维茨曾说过,战争是贸易的继续,但掺和其他手段。²²而 17 世纪流行的观点则是,贸易是战争的一种形式。这种极端的重商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克林顿政府为了扭转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决心运用多轨战略,在贸易政策上采取强硬态度。克林顿在多边主义议程上极力推动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进程,促进全球市场准入和关税减让;在地区主义议程上,克林顿政府极力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扩大了美国的出口领域,而且使美国公司更易于在加拿大和墨西哥从事经营活动。克林顿还对 APEC 抱有很大兴趣,一方面,由于乌拉圭回合谈判旷日持久,克林顿政府准备将 APEC 作为乌拉圭回合失败的一个替代方案,以对付日益加强的“欧洲堡垒”;另一方面,克林顿政府不希望看到东亚地区出现一个排他性的贸易集团,尤其是将美国排除于外的贸易集团。此外,克林顿政府更加频繁地动用“301”条款,以其国内法惩罚其他贸易伙伴,这反映了霸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将调整成本转嫁到其他国家身